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1920~2008: 全 14 卷 / 杨
胜宽等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458-0636-6

I. ①郭… II. ①杨… III. ①郭沫若(1892~1978)
—思想评论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3559 号

责任编辑 王 璇
技术编辑 吴 放
装帧设计 郦书径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1920—2008)

杨胜宽 蔡 震 等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247.125
字 数 6,770,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636-6/K·93
定 价 1800.00 元

顾问

章玉钧 谢保成 谭继和
魏建 李怡 王锦厚
祁和晖 彭邦本 魏红珊

总主编

杨胜宽 蔡震

分卷主编

《总论卷》：税海模 蔡震
《史实卷》：廖久明
《交往卷》：廖久明
《思想文化卷》：陈晓春 王海涛
《文学·诗歌卷》：雷业洪 张昭兵 陈俐
《文学·戏剧卷》：陈俐 杨兴玉 何玉兰
《文学·小说、散文、中外文学比较卷》：陈俐 邓芳
《历史卷》：何刚
《考古、古文字卷》：陈仕益 杨晓宇
《教育、新闻出版、书信、书法卷》：廖久明 熊泽文 王立新
《研究之研究卷》：税海模 蔡震

其他参与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天乐 于立得 万保君
邓帮云 令狐兆鹏
陈大川 杨宏 李畅
余玲 张远东 苟兴朝
罗春 赵学彬 徐立昕
唐瑛 卿玉弢 龚盖雄

凡 例

一、本汇要收录郭沫若研究文献的时限为 1920 年至 2008 年。

二、本汇要收录的是国内发表的研究郭沫若的代表性文章；考古、古文字方面的回忆文章，如包含有不可或缺的评论文字，则予节录收入。

三、本汇要优先选择具有原创性和史料性价值的文章，后来发表者如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则酌情选录。

四、郭沫若研究的重要著作按存目处理，其他著作中与郭沫若研究有关的章节均按单篇文章处理。

五、同一专题的文章以发表先后为序集中编排（“史实卷”则以相关问题的时段性为序编排）。

六、为了全面反映 90 年来郭沫若研究的总体状况，凡符合以上标准的文章都在入选之列，以期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各种学术观点。

七、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文献的本来面目，反映其时代特征，仅对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更改：（一）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二）脚注、尾注、参考文献统一置于篇末；（三）明显错误的字词、标点符号等。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总主编 杨胜宽 蔡震

1920-2008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目 录

导言	1
诗人郭沫若(节录)	钱杏邨 38
致郭沫若(1935年5月28日)	瞿秋白 43
郭沫若先生的革命性	艾 云 45
我们应该研究郭沫若先生的作品	欧阳凡海 48
伟大的“芦笛”	罗 荪 51
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认识	李初梨 53
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	老 舍 57
学习郭沫若,研究郭沫若(节录)	石西民 60
正确评价郭沫若同志	李一氓 66
实事求是地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郭沫若(节录)	夏 衍 71
郭沫若与哲学	刘大年 76
《郭沫若选集》(英文版)序(节录)	成仿吾 82
集诗人、学者、政治家的特色于一身	
——读郭老《文史论集》札记	祁和晖 95
中国现代“文人”的一个范本	魏 建 105
无法回避的抗争	
——评《郭沫若总论》	瞿清福 113
我的郭沫若观:关于一种文化人格与文化精神的省察	潘世圣 130
消解:郭沫若的文化宿命	章亚昕 142

中西撞击中隆起的文化峰峦

——我的郭沫若观	税海模	148
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郭沫若	朱贵平	158
论郭沫若人格系统	黄丽华	164
“我的郭沫若观”学术讨论会评述	晨雨	174
论政治生涯中的郭沫若	张毓茂	177
踏着一代文化伟人的历史足迹	胡绳	186
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	黄侯兴	195
在历史、现实与理想关系中的文化构想		

——论“五四”启蒙主义者郭沫若	蔡震	212
郭沫若与屈原人格	罗成瑛	225

人与文：完成的以及未完成的

——郭沫若后期文艺思想及创作反思	吴义勤 季进	236
历史意识与当代意义		

——论郭沫若的当代性	蔡震	249
文坛史林风雨路·代序：“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林甘泉	262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知人论世”		

——谈正确评价郭沫若	马识途	289
与时俱进的 20 世纪中国文化巨人	章玉钧 谭继和	295
中国“歌德”之道路		

——论郭沫若解放后的思想和文艺活动	程光炜	310
郭沫若人格流变简论	税海模	325
略说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	黄修己	337
与时俱进，创造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		

——纪念郭沫若诞辰 110 周年	李铁映	342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	章玉钧 谭继和	348

郭沫若与中国 20 世纪学院派文化的分离	李 怡	365
郭沫若与创造精神	杨胜宽	371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造山运动”中		
——简论郭沫若的学术与他的时代	朱寿桐	383
关于晚年郭沫若	邵燕祥	396
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中的“郭沫若现象”	宋剑华 田文兵	399

导 言*

郭沫若研究起始,可以说几乎同步于他以新诗创作踏进“五四”文坛之时,迄今已历经九十年。九十年时间,给一个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片足够其发展的历史空间,也为这个研究领域累积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足以推动其今后不断发展的文献资料。郭沫若研究的发生、演进、流变,经历了从诗歌评论开始,到文学创作、学术著述、思想轨迹、文化活动等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逐次展开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从单一角度的认知到开放性视野的考察,逐层深入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九十年学术研究的进程,已经需要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疏理、思考和总结,传承既往,超越今天,面向未来。这就是编纂这部《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以下简称《汇要》)的目的所在。

—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文献资料汇编,《汇要》具有学术编年史叙述的特性和意义,其编纂的一个基本架构是循着郭沫若研究的历史脉络。

纵观郭沫若研究的整个历史演进轨迹,1949年、1978年无疑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除此之外,1941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点,它们将郭沫若研究大体上划分为几个表现出不同特征和不同学术水平的历史阶段。

1920年前后的两三年,是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由此进入“五四”新文坛。最早对于郭沫若的研究,是1920年前后对于其陆续发表的新诗作品进行评论的零星文字。诗集《女神》的问世,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自由体新诗的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集,《女神》受到新文学批评的大力关注,

* 蔡震执笔,杨胜宽主持定稿。文中第四部分采用了何刚起草的部分文字,第二部分参考了王海涛起草的相关部分文字。

郭沫若亦以一个新进诗人的姿态为新文坛瞩目。这种关注和瞩目,很快越过了新诗批评的范畴,而进入到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活动持续不断的思考、评判,即使在他一度远离了新文坛的时候。这构成了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郭沫若研究的一段历史。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研究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研究的范围随着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的行进路径而发展、延伸,研究对象主要是单一性的作品集或某一文体形式的作品。对诗集《女神》的评论,是郭沫若研究初始的聚焦点,然后是对于《星空》、《瓶》等“《女神》以后的诗”的陆续关注。诗歌创作之外,郭沫若早期的戏剧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先后次第进入到批评、研究的视野。钱杏邨的《诗人郭沫若》、沈从文的《论郭沫若》等,是不多的几篇铺陈开一个作家论框架的文章,但它们基本上还是仅从郭沫若的作品切入,进行作品评述,并由此对于郭沫若其人予以褒贬。

其二,研究的方法是评点式、印象式的批评,主要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对郭沫若的创作进行思考。尽管如此,由于批评者大多亦是新文学创作的参与者、实践者,他们对于研究对象直观、敏锐的感悟和认知,自有其切中肯綮的理解阐释。在他们并不太具有理论思辨性的论述中,表达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其中一些观点甚至成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述,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影响到郭沫若研究。譬如:闻一多关于《女神》时代精神的论述、朱自清关于《女神》泛神论色彩的评点、郑伯奇对于郭沫若与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阐释等等。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初出版,郭沫若在此前后正式开始了历史学、古文字学领域的耕耘,对于他在这两块学术领域研究工作的评论也随之开始。与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关注、批评不同,对于他学术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评价与讨论,尽管郭沫若在1930年代的学术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更多的是在金文甲骨之学方面。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可能由于鲜有人能够真正进入古文字研究的专业领域去品头论足,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撰写到出版,就是被时势纳入到19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情境之中了。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评述,

虽多涉及到对郭沫若研究方法的臧否,但主要内容是关于具体观点的讨论、批评。而且这样的讨论在大多数文章中,与其说是批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如说是借评说郭沫若,来表达文章作者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实际上成为一场学术论争的一个历史场景。

尽管如此,郭沫若研究毕竟进入到历史学领域。于是,无论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者而言,从文、史两个方面展开的郭沫若研究,此后构成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

1941年之所以值得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来关注,是因为在左翼文化界纪念郭沫若诞辰五十年和创作二十五年之际,对于他的认识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在纪念活动前后发表的许多文章虽然都是带有纪念性意义的文字,但诸如《郭沫若先生的革命性》、《诗人,战士》、《伟大的“芦笛”》这样的命题,显示了与此前不同的批评视野和立论的思考点。针对郭沫若作品的评论,拓展到对于郭沫若其人,其人生经历、思想历程等问题,进行整体性的观照、思考、评述。更重要的一个变化是,郭沫若研究开始进入到一种政治文化的语境中。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他把郭沫若置放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置放于社会革命运动的时代浪潮中,对郭沫若走过的道路做出了完整的评价,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①周恩来不是学术研究领域中人,但他的文章以鲜明有力的逻辑论辩,实际上为郭沫若研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评判的价值标准。这可以在郭沫若研究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

周扬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已收入《汇要》,不另作注。以下同此),从《女神》的创作切入,对于郭沫若做出了精辟的分析论述,是这一时期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并与《我要说的话》相映成辉。而围绕《甲申三百年祭》的批评,则表现出更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站在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上的评论者们对于该文的解读和批评,都在相当程度上超出或者放大了该文本实际具有的学术内容,因为那是基于现实政治功利的需要。

郭沫若研究出现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在文学和学术之外的,即,作为研究对象的郭沫若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潜在的变化。他(在研究的视野中)不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或者学者,而被时势赋予了一种政治期待。

从抗战中期开始,郭沫若陆续创作了几部大型历史剧,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先秦思想史的文章,它们是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就之所在,亦成为这一阶段郭沫若研究的主要内容。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与共和国所有的文化事业一样,郭沫若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郭沫若继续被关注,主要不再基于他创作或发表了什么之后引起的即时性批评。对郭沫若的研究开始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范畴,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路径,也具有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从文艺批评关注的研究对象到文学史研究的对象,郭沫若研究的这种变化是巨大的,并且一直影响了这一学术领域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一变化的出现,是随着现代(新)文学史的书写和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立而发生的。

建国伊始,教育部即规定了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将现代(新)文学史作为主要课程设置,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9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但写于1950年代初)等,即是以这一课程的讲义撰写而成的最初的现代(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也由此开始。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开宗明义,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阐述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来规定。”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这样一个基本定性,成为书写现代文学史的“纲”,确定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学术语境,现代文学史实际上成为一部左翼文学史。于是,对于郭沫若的认识和评价,必然要进入到这一历史叙述的框架之中,它也必然为作为文学史人物的郭沫若确定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位。一方面,是在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描述郭沫若;

另一方面,对于郭沫若的书写,成为左翼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构成。这正延续、吻合了前一历史阶段周恩来等人阐释的关于郭沫若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

从最初在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叙述中论及郭沫若的新诗、文学活动,到列有专节评述《女神》或郭沫若的创作,再到以专章全面记述郭沫若的生平、思想、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现代文学史书写郭沫若的篇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详尽。这当然促进了文学史书写之外郭沫若研究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逾三百篇的研究文章发表。

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是第一部研究郭沫若的专著,对于郭沫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艺思想中的泛神论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陈瘦竹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从美学的角度提出并阐释了郭沫若历史剧作为一种悲壮剧的概念。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臧克家《反抗的、自由的、创造〈女神〉》、艾扬《试论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等文章,都在各自思考论述的问题上有精辟的见解。这些论著和文章所提出并研究的问题,展开的研究视野、研究思路,以及具有的学理深度,代表着这一时期郭沫若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

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以纵向的历史阶段划分,与横向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社团、文学创作(又按文体形式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区分之)这样几个方面的相互结合,勾勒出文学史的格局和脉络,以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这种研究路数对郭沫若研究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多数郭沫若研究的论著、文章,从研究视点的切入,到具体选题的确定,进而展开论述,基本都遵循着这样的模式。

总体来说,进入到现代文学史学术语境中的郭沫若研究,在成为文学史研究重要内容的同时,从深度、广度上都有所拓展。郭沫若研究具有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比较厚重的历史感。

但与此同时,这一学术语境又从另外的方面局限了对于郭沫若文化内涵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掘、认知和思考,因为一旦讨论的问题超出左翼文学史的

评判标准可以包含和包容的范围,势必被质疑并排斥。楼栖关于郭沫若泛神论世界观、“纯艺术观”的论述,曾引起较大的争论,除作为学术意义的歧见,主要原因应该在于他的论点与对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相抵牾。而王淑明认为郭沫若历史剧中贯穿着“人的尊严,把人当成人,能过人的生活”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体现出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见解,很快就遭到指责和批判。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研究明显缺少实证的研究。这一缺失和不足,显然也是受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与进入文学史视野的郭沫若研究不同,这一时期在史学方向上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实际上是将郭沫若和他的学术观点纳入其中的一个学术讨论的过程。譬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的讨论。这还并不是真正以郭沫若的史学著述和活动作为一个学术思考对象的研究。

1978年郭沫若逝世。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所致悼词,对于郭沫若有一个全面的政治文化评价。他称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作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②

郭沫若逝世之时,恰逢十年动乱后新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涌动,各项学术文化事业面对一个大发展的机遇。

一个高度的历史评价与社会时势的机遇,使得郭沫若研究立刻呈现一片蓬勃发展的态势,也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此时的郭沫若研究在文学史、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各个学术方向、学科方向上全面展开,郭沫若生平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大都进入到研究的视野中,研究的方法、思路也呈多样化趋势。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研究以及出版,在郭沫若研究中开始得到重视,并且很快建设了一个学术资料的平台。历史学领域的郭沫若研究尤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现代史学史、学术史进程的视野中去思考、讨论郭沫若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他的治史方法和学术理念、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的历史建树等等,为这一方向上的郭沫若研究打开了路径。

就郭沫若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研究所涉及的知识子系统而言,郭沫若研究逐渐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后来有人更提出“沫若学”的概念,这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

新时期郭沫若研究三十年的总趋势,是一个学术上不断拓展和深入的过程,但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冷热沉浮的变化。

新时期之初,郭沫若研究的论著、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在成为研究文献的资料,相当大的部分出自那段时间。郭沫若研究一时成了学术领域的热门,甚至有成为显学之势。这虽然将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并且铺陈开一个盛大的局面,但其中趋之若鹜的学术浮躁和非学术因素的推波助澜,也使得研究中出现了偏差。“旗帜”的评价具有浓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由此而引出的一种学术倾向,就是将研究对象情感化、政治化的一味拔高,这甚至表现在一些回忆、整理史料的文章中。

当思想界、学术界以至全社会开始对于既往的一段历史进行精神自省的时候,当人们尝试着以多元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回溯历史的时候,一种新的学术动向、学术环境出现了。“重写”历史成为一个学术焦点,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热度则急剧下降,一度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出现了

截然相反的观点,乃至出现了将其丑化、妖魔化的极端看法。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一个学术态势的变化,是对于那种用政治或意识形态语境来代替学术语境现象的反思和匡正,是郭沫若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应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期待:挤出学术泡沫,摈弃陈旧观念,勇于学术创新。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情况也反映了某些反历史主义的社会思潮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那种把郭沫若有意从政治上丑化、庸俗化的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借题发挥,把郭沫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以便从文学、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否定一段历史。尽管这样的文章多没有学理的论辩,多是一些随感式的议论,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对于郭沫若研究还是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在经历一番波折之后,随着学术环境的理性回归,人们可以在实事求是的冷静思考中去科学理性地反思历史,郭沫若研究也回复到一个研究领域应有的学术常态。几乎停滞了的文献史料的整理工作得到加强,实证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不断有新的研究课题开掘出来,深入进去。比之新时期之初,郭沫若研究去除了浮躁的喧嚣,正扎扎实实地前行。

二

郭沫若的一生活活动在一个多方面的文化空间之中,郭沫若研究也就逐次展开在这一文化空间的各个方面,这是《汇要》编纂的另一基本架构:在不同学科领域和学术方向上分门别类。

在习惯上,郭沫若研究被区分为文、史两大部类。这一方面是鉴于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大的学科方向;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学科归属的基本分布而言。这当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性分类。郭沫若研究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它交叉在许多学科门类之间,所以《汇要》的各个卷次,是根据郭沫若研究文献的实际情况,将研究论题涉及的不同范围、不同的学术方向、不同的学科领域,几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划分的,力图全面而又条分缕析地反映研究的整体风貌。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于郭沫若的研究,首先需要有人在整体上、宏观上的考察、认识、评价,也就是总论。这既是一个面对研究对象所需要的研究视界和路径,亦是一个研究的“纲”。它会影响制约郭沫若研究的总体趋势,同时又反映出一段时间内学术研究的总态势。

当郭沫若还属于时代人物的时候,关于他很少有总论的研究,钱杏邨的《诗人郭沫若》是凤毛麟角。他在人们多还着眼于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作诗评、剧评时,就提出了对于郭沫若的一个总体认识和评价。他全面考察了郭沫若的诗歌、戏剧、小说创作以及思想演进的过程,强调指出:郭沫若的思想,“可以代表‘五四’以来的中国的向上青年”,“他的思想的转变就是中国十年来向上的青年的思想的转变”。“他收束了旧的时代”,“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一个诗人”。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我要说的话》当然是最有分量的一篇总论。周恩来是从与鲁迅的比较中去评述郭沫若的,这样一个切入的角度,很好地将其所“说的话”展开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上。文章在描述了“鲁迅的时代”之后写道:“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山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山来的”。“因此,我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山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文章接着论述了郭沫若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